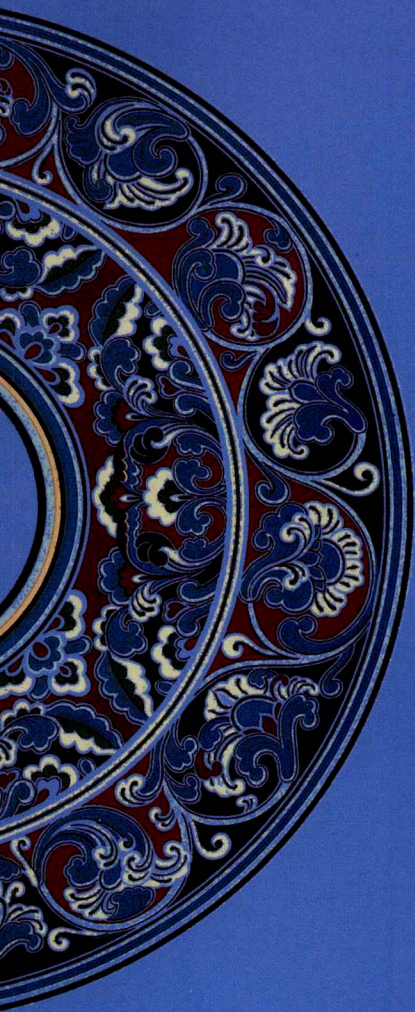


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研究

吕豪爽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ZHONGGUO XINSHIQI SHAOSHUMINZU XIAOSHUO YANJIU

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研究

吕豪爽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开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研究/吕豪爽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649-0207-0

I. ①中… II. ①吕…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学—小说—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I20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1441 号

责任编辑 焦向荣

责任校对 言 午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133 千字

定 价 23.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导论 文化诗学视阈下的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	(1)
第一章 多元文化姿态下的多元文学景观·····	(17)
第一节 执著于一方水土的故乡守望者·····	(21)
一、为“吾土吾民”而歌·····	(22)
二、为母族代言·····	(28)
三、坚守之态的利与弊·····	(34)
第二节 汇通于世界潮流的人性表达者·····	(36)
一、开放性文化心态与开放性资源利用·····	(36)
二、回归母族于想象虚构之精神原乡·····	(39)
三、寓普遍性追求于异域之境·····	(46)
第三节 其他典型姿态描述·····	(52)
一、追随于现实境况的民族思索者·····	(53)
二、致力于经验传达的个人书写者·····	(59)
三、栖息于多种文化的精神崇尚者·····	(63)
第二章 民族文化的深层影响与文学文本的主题话语·····	(67)
第一节 遭遇:困惑与抉择·····	(68)
一、少数民族的文化处境与遭遇主题的发生·····	(68)
二、少数民族作家的两难文化心态与遭遇主题的精神内涵·····	(69)
三、遭遇主题的基本表现形态·····	(73)
四、遭遇主题的价值意义·····	(85)
第二节 自然:敬畏与和谐·····	(86)

2 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研究

一、少数民族文化圈中的自然本体	(86)
二、作为少数民族小说主题话语的“自然”	(89)
三、少数民族自然主题叙事的意义	(103)
第三节 死亡:坦然与反思	(104)
第三章 审美观念的选择整合与文学文本的艺术创新	(117)
第一节 双语思维与汉语表达	(121)
第二节 多元文化滋养中的意象营造与形象塑造	(131)
第三节 外来经验启发激活的叙事变革	(144)
第四章 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的价值定位	(156)
第一节 作为文学文本呈现的文化与美学价值	(156)
第二节 作为文学创作具有的昭示与启迪意义	(161)
一、边缘与中心的辩证	(162)
二、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互动	(165)
结语	(169)
主要参考书目	(172)
后记	(180)

导论 文化诗学视阈下的中国 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古至今都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坛纷繁多样的新时期亦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黄金期,尤其是小说体裁在此期间已经呈现出由边缘向前沿挺进的趋势。与创作领域兴起的波澜不甚协调的是相应的评论与研究的相对沉寂。在本土文化和边缘文化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今天,将目光聚焦于与少数民族文化脐带相连的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已成自然之势。选取在国内乃至国际平台上产生一定影响力的少数民族小说的精品作为具体研究对象,以期在此基础上收获更具代表力度和研究价值的结论。借助兼顾文化指向与美学质素的文化诗学的批评理论透视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以期择取更能契合研究对象本质,显现研究对象光彩的方式切入。于此视角下,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选择成就了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的凸显。他们以开放的心态超越一族、一己之界达至多元与终极,在文学永恒之命题上阐释表达母族意念,在多方文化之兼容整合中进行艺术创新。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由此得以与其他文学样态平等对话且又特异卓立。

—

对“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学术界在漫长而又自由的探讨和认知过程中形成了多种见解。然而,百变不离其宗的是三条基本的依据或曰标准:第一即作者应具有的少数民族身份,第二是作品所体现的少数民族特色,第三则要求创作所运用的为少数民族的本民族语言。三条标准,只取其一、兼取其二或三者兼备,决定着所谓“少数民族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影响着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构建,同时也相应地规约着人们的思维惯性。其实,正如杨义所言:“这三条标准具有文化内涵上的梯级关系。只具有第一条,属于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少数民族文学,加上第二条而只用汉语写作,说明少数民族特色更多了一些。如果三条皆备,则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浅的严格形态上的少数民族文学。三条标准拥有程度上的差异,说明中华民族是在长期的曲折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个伟大的文化共同体,同时这个文化共同体内部构成存在着复杂的、多元的、相互借鉴的子系统。三条标准之间存在一加一、再加一的递进关系,并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有容乃大文化哲学。”^①对“少数民族文学”而言,这是一种很好的理解和认知方式,它将少数民族文学放置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和当代版图中评价定位。然而,理解之外的研究工作需要的是审慎和明确。在本书中,将以第一条标准,即作家的民族身份作为划分少数民族文学的依据,在此基础上确立论述范围和论述对象。因此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要求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创作出具有

① 杨义:《展示当代中国文学地图新的一页》,2005年5月20日《光明日报》。

民族特质的作品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一个相对严苛的标准,尽管有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在实践着宝贵的双语创作,然而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真实状况是只会用母语进行口头交流,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熟练地驾驭汉语,运用汉语反映本民族的现实生活、张扬本民族的内在精神。如果将这样一部分作家和作品排除在外,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实绩会逊色很多。在一个文化转型、文化重组日益加剧的时代,少数民族文化的保存和弘扬只依靠本民族的流传和坚守是远远不够的,想要有更多的人珍视,其价值就需要有更多的人了解,从这个意义而言,文学是窗口,汉语表达就是不可或缺的。语言的障碍和感受力的制约使本书只能选取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中的汉语文学创作,它虽然仅仅只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同时也是影响力和辐射力较大的所在。第二,我们在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看不到明显的民族色彩,这可能是由外部环境、作者成长历程、文化选择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从纵向上看,它体现出一种文化语境的变迁;从横向上看,它则体现出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整体格局的多元性和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建构的开放性。简单地将这部分作家与作品排除在外可能会影响我们对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准确把握和深入探讨,因此本书也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分析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姿态和文化立场时论及。第三,新时期有许多汉族作家出于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兴趣爱好创作了具有少数民族风情的作品,如王蒙、迟子建、张贤亮、范稳等,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学术界将他们的这类作品界定为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由于这些作家的创作心态、创作背景和创作资源与少数民族作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他们的生命历程和作品风格更多地呈现出个体性和复杂性,

因此,本书暂不将他们纳入研究视野之内。

“少数民族文学”的范围一经划定,“少数民族小说”的指涉就不言而喻了。新时期是少数民族文学取得辉煌战绩的时期,在众多的体裁中,小说又异军突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心本体,历来是诗歌,特别是民歌。”^①然而“在新时期崛起的第二个少数民族作家群中,从事小说创作者则占多数”^②。小说创作的队伍在壮大,小说取得的声誉和形成的影响力也是令人瞩目的。少数民族小说纷纷荣膺各种文学奖项。阿来的《尘埃落定》问世之后,成为唯一入选“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的当代经典,“尘埃落定”一词也如同达至生命顶峰一般频频见诸报端,艺术、体育乃至政治,个个领域都得到恰切的应用。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这个富有召唤力的课题,等待着人们对其价值进行更深入的开掘和认可。这也是本书选取其作为研究对象的初衷。

随着文学在社会边缘位置的确定,随着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转型,随着全球一体化制造的文化焦虑,小说日益成为评论家担忧的对象,人们开始寻找文学大师,开始呼吁文学经典的出现。雷达在《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一文中将当前文学的缺失归因于作家生命写作灵魂写作的缺失,肯定与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的缺失,对时代生活和现实生存进行整体把握和精神超越的缺失,原创能力的缺失。^③ 这些固然是需要注意的问题,但文坛对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似

① 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下)》,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16页。

② 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下)》,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20页。

③ 参见雷达:《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2006年7月5日《光明日报》。

乎过于悲观,“‘经典’都具有规范、规则的意思,它不但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以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更包含此类文本所藏含的制约、规范人类思维、情感与行为的文化”^①,因此,“文学经典”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制约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时间的验证,也在持续不断的被阐释、被接受、被解构中丰满。如此看来,当代小说创作还没有太多机会获得“经典”的称谓,但没有公认的经典不代表没有精品,当下的精品或许在未来成为经典。我们有着对同时代文学进行挖掘、梳理的责任,我们“需要捍卫当下的小说形势,捍卫当下小说高端的艺术成果和他们的倾向,以解脱我们对小说总体评价的困惑和隐痛”^②。具有较高水准的年度作品选编体现出评论家开掘精品的努力,而在少数民族文学界,这种努力同样存在。如1999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玛拉沁夫、吉狄马加主编的八卷本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就集合了新中国成立50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方面的优秀之作。所以,对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中的精品进行细读、整理和定位也成为本书的重要任务之一。本书将选取新时期不但在少数民族文学界而且在全国平台上均产生一定影响的作家作品,如获茅盾文学奖的李準的《黄河东流去》、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阿来的《尘埃落定》,获鲁迅文学奖的叶广芩的《梦也何曾到谢桥》、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这些作品能够代表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的较高水准,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研究也就相应地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① 陶东风:《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经典》,2005年3月24日《人民日报》。

② 孟繁华:《这个时代的小说隐痛——2004〈小说选刊〉季评(之一)》,《小说选刊》2004年第4期。

二

20世纪以来,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方法出现多样性,“先后引入文艺学方法、民族学方法、文化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分析心理学方法、仪典学方法、地理学(劳兰学派)方法、符号学方法、民间散文作品AT分类法、原型批评法以及现代派、超现代派的若干方法等等,实践表明,这些方法都各有自己的角度和优点,也各有自己的局限”^①。但是它们毕竟从不同角度开掘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

考虑文学与文化、小说与文化的内在关联,我们这里选取从文化的视角对研究对象加以考察。何谓文化?现代相关“文化”的概念不下200余条,有的从构成因素上来界定文化,如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②;有的从人与文化的共建关系界定文化,如《中华文化史》作出的阐释:“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③我们一般理解为包括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在内的广义的文化,即人类创造性活动的总和,概括地说也就是“自然的人化”。狭义的文化单指精神文化。但无论是广义的文化还是狭义的文化,依据经典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

① 梁庭望:《20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② [英]泰勒:《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③ 冯天瑜主编:《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

论,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都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对作家、文本、读者,对作品的创造与传播等文学活动的每一环节都有着深层的影响。作家作为心理构成和创作行为有突出文化倾向的特殊的文化创作主体受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在文学作品中包蕴着共时性的文化转换和历时性的文化积淀,给读者提供了文化阐释的前提和空间。文化、作家、文学始终处在一个张力场中。因此,“文学既是一种复杂的人文现象和文化现象,又是独特的艺术现象和审美现象;它既植根于广泛的文化结构之中,关联着人类的文化精神、文化心理与文化人格,有普遍的文化品格和文化属性,又依存于特定的语言形态,关联着人类的情感、心智和形象,有突出的审美品格和审美属性”^①。而具体到小说,小说也就成了小说家、小说家所处的文化的一种形象化的载体和表征。它“以‘虚构’为特征、为方式、为途径,在‘虚构’的实施中,已经吸纳了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变革、民族与个体等方方面面的文化因子,并将这些因子充斥到小说的人物、主题、意象、技巧、意味等‘小说构件’的制造、装配和程序设计之中,在小说的自律运作中,既体现了小说家——小说文本的生产者对文化的消化与传承,又以特殊的方式汇聚到特定文化体系的协奏之中,成为文化演进中的一种表征”^②。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所处的文化境遇、所内蕴的文化含量以及与少数民族作家文化选择之间的关系,种种特殊性决定了选择文化的视角才能更好地将研究引向深入。

然而大而化之的文化视角、文化研究是不足取的。中国文艺理论界在外来理论的引介和启迪下开始倡导“文化诗学”。“文化诗学”

① 畅广元主编:《文学文化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② 刘洪一:《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由美国新历史主义的主将斯蒂芬·葛林布莱特提出,用于概括自己的批评主张和批评方法。^①传入中国之后,这个概念已经经由中国化的过程而具备了新的内涵。有研究者认为“我们当下的文化诗学的深层动机是由文艺学困境出发,同时也是对当代中国文化话语困境的一种解决路径,是对过于意识形态化的绝对性话语的曲折抵抗,是对单纯技术性解读文本研究取向的校正,它试图以文化话语的名义解构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它试图以体验为核心强化文学的意义世界对人的精神世界建构的价值”^②。无论它出现于何种境况,都为文学研究的新状态提供了一种可能。童庆炳认为“文化诗学”在中国有着深厚的现实土壤,^③作为文学理论的新构想,它具有语言之维、审美之维和文化之维三个维度,具有现实品格、跨学科品格和诗意品格三种品格,它追求的是现代人性的完善与复归,它“把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贯通起来,在文学研究和批评中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揭示出现实所需要的文化精神”^④。蒋述卓认为“文化诗学”就是从文化的角度对文学进行批评,其价值基点是文化关怀和人文关怀,其内涵的具体表现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作品表现出来的文化哲学观,解决一下叙述者的文化立场与文化背景问题;二是把作品描绘的社会状态、人物命运与心态放到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去分析,解决文学作品与

① 参见[美]斯蒂芬·葛林布莱特:《通向一种文化诗学》,载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盛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② 田中辉:《文化诗学的三个问题》,《文艺争鸣》2004 年第 6 期。

③ 参见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 年第 6 期。

④ 童庆炳:《“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新构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 年第 1 期。

文化背景的关系问题；三是关注作品对文化人格的建设，解决一个批评的时代性问题。而它的阐释系统是建立在东方与西方、现在与未来、作者与大众、作品与社会的对话的基础之上的。^① 尽管对“文化诗学”的具体阐释有所差异，且未形成严格的“教义”，但在一些核心的规定性的性质上是达成共识的：首先，“文化诗学”追求文学的文化价值属性与诗学价值属性的统一，将对文学的诗情画意和文化含蓄的考察相结合，将文化与诗学看成一种整体性的互文关系。其次，“文化诗学”具有开放性的理论品格，注意文学现象的可开发性，注意文学作品的场性效应，不囿于文学的自律，从语言、神话、宗教、历史、科学、伦理、哲学等跨学科的文化大视野来考察文学。最后，“文化诗学”体现一种现实关怀，不将文学视作孤立自足的整体，面向人类的生活和生存实践、精神和文化现实看取文学。这三点就成为本书的指导和凭依：力图在对具体文学文本的细读分析之上，对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进行文化与美学的双重考察，以对未来的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有所启示。

三

在文化诗学的视阈下对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做一考察，如果面面俱到也不免乏味，如张承志所言，“正确的方法存在于研究对象拥有的方式中”（《学科的黄土与科学的金子》）。研究者需要做的是捕捉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碰撞之时最易产生火花的闪光之所在。本书的展开和深入还需要以对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的文化处境的勘测为

^① 参见蒋述卓：《走文化诗学之路》，载蒋述卓主编：《批评的文化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前提。

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各国的交流日益频繁,科技和经济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塞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和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提醒了人们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的存在,催生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世界文化多极化的进程在悄然推进。此外,贫富不均、环境破坏、种族冲突、信仰危机,这些现代社会的种种难题让人们对于以西方化为主流的现代化产生质疑。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古老的东方,“东亚文化复兴”、“印度教文化复兴”、“伊斯兰文化复兴”相继出现。经济技术全球化与精神文化多元化的并行不悖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独特景观。文化研究成为20世纪末以来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在罗纲、刘象愚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所归纳的文化研究的五大倾向中出现这样一条: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主流文化不同,文化研究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①而在1990年于美国召开的以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上,与会者对文化研究的学术地位、特征、目的、范畴和方法进行了辩论和论证,也对文化研究的主要课题进行了归纳,其中包括“民族性与民族特征”以及“种族与少数民族”^②。从国内环境看,新时期文坛逐渐走向多元,文化氛围的相对宽松和文化转型的不断迫切使少数民族作家接触到更多的异质文化和外来文化,随着文化素养的提升和文化视野的开阔,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民族文化的相对独立性、艰难的现实处境及深蕴的积极意义,

① 参见罗纲、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 陈茂林:《新世纪西方文论展望:文化研究与生态批评》,《文艺理论》2003年第7期。

于是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并持续增强。全球一体化趋势生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焦虑,学术界出现了“国学热”,而文学界兴起了“寻根热”。许多作家转向儒释道传统文化、各种地域文化和少数民族异质文化,转向这些能在内容、形式、语言乃至精神气质上给予文本光泽与亮点的文化母体。少数民族文化得到空前的关注,歌手大赛设置原生态唱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落到实处。世纪之交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而“西部大开发是政治、文化、经济多重目标的整合,是对西部生活、西部生存状态的整体介入,这就决定了它具有广泛、深刻、可持续的影响”^①。多集中于西部的少数民族文化、文学具备了创生新品质的可能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环境,都给中国少数民族小说提出了共同的要求,那就是国际国内平台之上的展现以及少数民族色彩的保持和彰显。那么,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在这种复杂的文化处境中是如何应对、如何决策的呢?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又是怎样克服障碍参与对话,怎样带着民族的声音跻身于前台的呢?我们在三个环节寻找到了答案,发现了作家的策略与智慧,而本书即将重点论述的三个章节也在自然中形成。

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在多重文化资源、多重文化身份、多重文化立场之间作出了不尽相同的文化选择,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姿态。有的扎根于故乡坚守于母族,怀着充当民族文化阐释人和代言人的热望执著虔诚地投入创作,有的身离故土却又心系故土,在自己营造的凝合民族神采和魂灵的精神原乡中传达对人类生存与本性的普适性命题的认知,有的悄然隐去少数民族作家的特殊身份而忠实关切于

^① 黄伟林:《中国当代小说家群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现实与命运的记录与思索,有的褪尽浮华,持守于作为一个现代个体的自由表达,同时以深度的思想和高度的技巧征服人心。这种少数民族作家文化选择的多元造就了少数民族小说景观的多元和文本精神指向的多元,对应于中国新时期文坛的变幻与多样,使得少数民族小说类同于全线出击,无论短篇体裁还是长篇体裁,无论乡土题材还是城市题材,无论传统章法还是先锋叙事,更多的领域、更多的场合都可以一睹少数民族作品的身影,少数民族小说在无形中扩大了影响。在第一章“多元文化姿态下的多元文学景观”中,我们选取了少数民族作家五种典型性的文化姿态,即“执著于一方水土的故乡守望者”、“汇通于世界潮流的人性表达者”、“追随于现实境况的民族思索者”、“致力于经验传达的个人书写者”以及“栖居于多种文化的精神崇尚者”,分别以石舒清、阿来、霍达、鬼子、张承志五位作家为代表进行专节论述,以期对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的整体格局形成一种宏观的把握。

随之而来的是第二章“民族文化的深层影响与文学文本的主题话语”。中国新时期文坛缺乏的不是作家作品的数量,它所期待的是独具个性的作家和独显特色的文本。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的多元还不足以使它凸显。主题和题材从十七年文学阶段开始都力图与内地主流文学保持一致的少数民族小说,在新时期初始阶段,在对诉苦、讴歌、反思主题的言说中依然继续着追随、呼应却又始终慢半拍的失却自我的创作之路。8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语境的变化,随着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意识的回归与自觉,少数民族的生存生活、少数民族的文化体系在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主题选择上的影响力度明显增强。生存环境、文化处境与宗教信仰上的共通性使少数民族小说